

· 教育基本理论 ·

公民视野中的责任教育

冯建军, 方 朵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近代西方公民是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权利公民, 权利公民过分追求自我利益, 导致公民公共性的危机, 当代公民身份正在从权利公民走向责任公民。公民责任是责任公民的本质要求, 公民责任指向公民共同体的利益, 是为公民公共生活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当代公民责任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公民强烈的责任意识, 激发公民积极的责任情感, 提高公民主动参与的能力。基于公民的责任关系, 公民责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全球的责任教育。

关键词: 权利公民; 责任公民; 公民责任; 责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7)07-0023-08

The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in the View of Citizen

FENG Jian-jun, FANG Duo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western citizen is the entitled citizen oriented by the liberalism, who has an excessive pursuit for self-interest, resulting in the public crisis. Contemporary citizenship is moving from the entitled citizen to the responsible citizen. Civic responsibil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responsible citizen. Civic responsibility point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ivic community, which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ivic public life. The mi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ivic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strong sense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to stimulate the positive civic emotion, and to improve the civic ability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ivic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 civic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covers education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othe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untr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whole world.

Key words: entitled citizen; responsible citizen; civic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7-04-17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JYA002);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支持计划资助项目(JY-006)

作者简介: 冯建军(1969—), 男, 河南南阳人,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研究; 方 朵(1991—), 女, 陕西宝鸡人,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我国学者对公民身份的讨论多集中于权利,忽视了责任;而对责任的讨论,又多关注个人修养和自我责任,缺少了公民的视野。当代公民身份正在从权利公民走向责任公民,这迫切需要我们关注公民责任问题,开展公民责任教育。

一、从权利公民到责任公民

古希腊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强调,共同体在重要性上优先于个人,公民的公共性优先于个体性。共和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以共同体和责任为向度的公民身份。但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旧有的政治体制,国家疆域的扩张使得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丧失了现实依托,同时民族国家的建立强化了个体权利,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社会流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应运而生。

1.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

与共和主义关注公共性不同,自由主义立足个人,关注私人领域,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一系列的权力以及对权利的获得和占有,个体性与权利构成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1]因此可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视为权利公民。个体的自然权利表现为拥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自由主义者以自然权利为基础,主张“个体拥有独立处理其财产和决定其行为的一切权利,无须得到他人的认可或听命于他人的意志”^[2]。个体作为“人”的自然权利在社会状态下转化为个体作为“公民”而要求国家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3],自然状态中的人成为社会状态中的公民,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这些权利,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中,国家只是个人的工具。同时,自由主义理论中所描述的个人,要么是霍布斯、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单子式的个人,要么是罗尔斯眼中对自己所处社会背景和个人身份一无所知的“无牵无挂的个人”。他们与其他成员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牵绊,因此个体不必关怀共同体和他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要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4]所以自由主义者将个人放在所有关系的首位,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者,而社会与共同体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始终先于共同体。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中的个人权利独立于其他价

值而存在,因而也具有绝对优先性。极端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与诺奇克强调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自由的重要性,拒绝一切集体或他人对个人权利的干扰。在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和重视中,自由主义的好公民不在于是否具有美德,而在于他是否能够纳税、守法、不违反公共规则等,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被动的“弱参与”,与其说是在承担责任,不如说是在履行义务。显然,自由主义理想中的好公民是消极公民的形象。

这种消极的公民观是基于个体性和权利而产生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每个人都处于一座孤岛之上,是单子式的存在。在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个体是根本,共同体为个体而存在;个人是目的,共同体是手段。尽管罗尔斯也关注公共领域,设计差别原则来照顾少数最不利者的利益,但通过正义的制度设计可能形成正义社会,却无法确保彼此相互关爱、和谐一致的正义公民产生。自由主义也承认公民美德和责任,但自由主义认可美德主要是为了避免权利和自由的滥用。“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公民美德厌恶冷漠和不公正,而‘静静的服从、顺从、毫无异议的奉献,以及谦卑,都不能算是自由主义的公民美德’;积极的意义上讲,它要求以下三个方面:节制、宽容和尊重。”^[5]节制、宽容和尊重等美德基本不涉及对共同体利益的维护和对其他成员的关爱。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中认同并不重要,参与只是一种交换手段,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所以自由主义并不重视参与,也忽视公民美德的内在利益,从而形成单子式个人的“唯我论”,造成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权利公民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印证,公民参与的减少、个体奉献精神的衰退和公共精神的缺失等种种现象表明,仅靠制度和程序正义难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个体仅承担利己的、消极的义务无法促进共同体的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开始反思社会问题和极端个人化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再次关注公共领域与公民责任。

2. 责任公民的现实要求

(1) 超越个体化的困境。

个体的独立性是人自由发展的结果,而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促使个人与外部世界分离,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和微弱的参与能力最终导致人与社会的对立,形成身份认同的困难和个体道德的缺失。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属于共同体,与所有成员息息相关时,才能彼此负责,克服当前身份危机的困难。同时,加强

对个体的责任感,能够促使个体规范自身行为,克服当前的社会失范和危机。

各种社会危机中,个人最先切身感受到的是身份认同的困难,具体表现为个人无法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归属感,在精神失落的同时感受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造成公民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当前社会处在一个高密度、快节奏的阶段,这种状态虽然有利于多样性的呈现和个人的选择,但也迫使个人陷入迷茫之中,人还没有认识到彼此的关联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就被卷入了变化的漩涡。主观方面是由于权利公民的本质是消极的,他们并不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而是更关注自身的利益,因而公民交往活动减少,个体远离公共生活,找不到对共同体的认同,容易走向封闭和孤独。“人越是与集体分离,他越脆弱,倾向于自我毁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同时与生命的联系也再次得到了强化。”^[6]要化解身份认同困难这一危机,个体必须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积极参与共同体的过程中发现他者、觉察联系,最终获得自我认同与被认同。

当代生活并不是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简单回归,不再要求人们将政治作为天然的生活方式或与共同体处于混沌交融的状态,而是在尊重私人领域和个人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了更有希望的回应,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参与机会更有利于引导公民有机融入共同体中。负责任的公民能够主动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在实践中认识到共同体并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是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记忆为基础的具有历史过程和精神生命的有机体。个体从出生开始便已经处于共同体内,这不是个人的选择,个人也无法选择,这是历史继承的结果。当公民接受自身归属于共同体的这种关系并参与公共活动的时候,就会在历史传统和当代文明中汲取营养,认同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度,在高密度和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个人行动的依据。最终,公民会怀着对共同体的忠诚和责任实现在各种关系中的身份认同。

个体化困境还表现为当代社会个体失范行为的增加。近代以来,个体本位的权利公民将现代社会仅看成是自由空间的扩展,将责任看成换取权利的交换品。在个人私利合法化,物质和经济水平成为衡量个体地位的当代社会,个人只看重眼前的利益,早已忘记个人的责任和对共同体的承诺。在私人利益的诱惑下,个人往往会抱有侥幸心理,不顾法律底线做出伤害他人利益和危害社会的事情。密集的社会网络将个人行为的后果传输到更广的范围中,社

会矛盾和个人恐慌也因此不断增加。应对诸多失范行为,法律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方面,现实情况和事态发展的紧迫性也要求公民个体必须规范和限制自身行为,不再为一己之私无节制地破坏个体与外界的和谐关系。

在根本上,个人道德失范是权责失衡的后果,对权利的偏重让个体忽视了责任和义务。在权责冲突之中,公民必须意识到公共性的重要,公共性要求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义务,还要有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关怀以及道德承诺等责任。当人们转变只重个人私利和个体享受的观念之时,就是对共同体和他人负责的开始。责任要求公民不再仅仅关注自身利益,而是要走出私人领域,实现与他人的合作与交往,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学会妥协,达成共识,形成对自由和权利内在自觉的限制,纠正个人的道德失范行为,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2) 应答时代发展的需要。

公民身份反映了个体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在具体时空中表达。当代民主政治条件为公民身份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契机,公民意识的发展又成为进一步民主化的基础。但长期以来,权利公民身份认为,社会的存在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只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人们参与政治是为了选择自己喜欢的服务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公民参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用最经济的手段应用于公民实践,在政治投票中选择能让他们受益的政党。^[7]因此,政治如同市场般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有着不同利益和动机的个人和团体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特定偏好和私利。^[8]这种政治市场化使得个体或利益团体借用经济手段控制公共事务谋取利益,侵蚀共同体的利益,形成虚假狂热的民主氛围。政治工具主义的结果是,国家变成保姆接替了原本属于公民的任务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在这样的民主模式中,政府集权而公民弱小,个体放弃了参与也不再彼此认同。所以权利公民这种既想要共同体的保护又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绝对统一的要求造成公民身份的内在紧张和对公共生活的无力。而社会团体的成熟、政治制度的建立只能保障公民参与的机会,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工具主义的危机。个人理性作为责任的表现,公民能够运用理性思考现实问题,以公共理性为指导进行公共生活和公共实践。因此,克服权利的滥用和以私利为目的的行为需要重新建立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责任体系,让人们认识到只有负起责任才能把握自由,实现真正的民主生活。责任对民

主建设能够超越工具制度的建设路径,责任公民身份有助于当前政治工具主义危机的解决。

不仅如此,责任公民的出现也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公民身份虽然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而出现,但公民身份的发展历史是不断包容的过程。全球化的发展为公民身份带来了新的变化,以地缘和血缘关系定义的公民身份随着国际组织的建立、移民浪潮的出现以及民族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需要重新定位,首先出现的是法律上公民身份归属的变化。为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许多国家开始承认双重国籍身份,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组织逐渐重视和接纳全球公民身份。这是公民身份的新尝试,同时也需要公民更广泛的认同和归属感。全球化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意味着更大的共同体的形成。公民在享有更多资源的同时,也将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而且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促进了公民关系网络的扁平化,公共治理全球化使各国公民不能忽视相互之间的团结。例如,贫困、生态危机、不平等加剧、种族歧视和地区冲突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它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全球公民是“一个体系,即我们在深思熟虑后准备自觉承担的责任和准备享有的相应的权利”。^[9]由此可见,全球公民最为本质的核心是责任,唯有责任公民才能承担得起维护人类共同体的使命。因此,责任公民不仅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发展之所需。

二、公民责任:责任公民的本质规定

责任公民是以责任为向度的公民,公民责任是责任公民的本质规定。

1. 公民责任的内涵

责任是指个人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以及对没有做好分内事情所必须承担的过失。公民的责任就是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个体作为公民,其责任不是指向个体自身,而是指向公民共同体,即对共同体负责。

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权利公民身份,只有义务,没有责任。义务是外在规定的要求,是与权利的等价交换,目的在于个人利益;责任是个体主动的、自觉的对共同体利益的担当。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

把义务看作公民最一般的、最基本的责任要求。公民责任不仅遵守秩序和履行义务,还需要公共性、美德、归属这些要素。“公民责任的目标之一在于强化将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纽带,从而弥补自由主义原子论的态度”^[10],因而凡是能够强化联系和维护共同体的做法,都可以将之概括为公民责任。它不仅超越了普通个体的责任,也超越了外在的规范和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公民责任与公民美德、公共精神相关。

完整的公民责任应该包括一般责任与公共责任。拥有一般性的规范责任是成为合格公民的表现,但只有同时具有一般责任和公共责任,才能成为责任公民。具体来看,个体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个人的公正、独立和勇敢等品质都属于规范维度的责任,可以归结为公民的一般责任。因为这种公民责任是基于法律规范、道德习俗等外在规定或因个体私人关系和利益互惠而产生的,这种责任遵守了公共规则,但其直接目的不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只有美德维度的公共责任才直接追求公共利益,原因在于个体认同了自己与他人的公民身份,对共同体产生了归属感,因此参与对共同体利益的维护。公民公共责任的核心要素是情感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参与,这正是责任公民主动性的形成机制。

因此,责任公民在一般责任基础上强调公共责任,如奉献集体、关注共同体利益和参与公共生活等。个体对他人和共同体的牺牲与奉献不仅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它是每位公民在理解自身与他人和共同体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之后自觉自律的担当。正如基恩所说:“我们可以把法律强加给我们的任务看作是义务,这种义务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与法律义务相反,我们可以把责任看成是自愿的,是团结他人或者同情他人的表现。在维持共同体存在的条件方面,健康社会所依赖的是责任,而不是法律强加的义务。”^[11]因此,从态度上来看,公共责任更具有积极色彩,拥有公共责任才能成就责任公民。在这种责任观下,好公民不仅是遵守社会规范的公民,更是对共同体充满感情并理性参与其中的实践者。在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责任公民能够认可和监督政府运作;在面对公共领域时,责任公民能够自觉参与并维护公共利益。^[12]

2. 公民责任的内在特性

第一,公民责任是公共性责任,即公民责任具有公共性。公民责任的公共性,一是指公民责任是公

开的。个体生活可以区分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公民责任指向个体的公共生活,存在于公共空间,面向公共领域。“公共性还意味着世界本身,人类生活世界本身是按照公共性机制衍生和发展的。”^[13]个体的语言和行动能够为其他成员所闻所见,公民之间相互承担责任,此时公民的个体性是属于第二位的。二是指公民责任是多元统一的,具有整合性。每个公民在自身目的的指导下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同时又内在通过整合自我与他人的存在不断构建自己,彼此之间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对公共生活的共同目的而形成彼此认同,相互承认各自作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所以公民是一种多元共存,不同的个体相互理解和负责,从而体认公共利益,公民责任是公共的但非共同的。三是指公民之间相互依赖,公民责任之间相互影响,目的是指向公共利益。公民责任是个体在共同拥有世界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每个人都与世界相联系,人人都与他者相依存,按照彼此的依赖关系参与公共生活,形成以合作和互助为基础的公共精神。因此,公民责任是个体在共同体中通过公共生活,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而自觉承担的义务和作出的牺牲。

第二,公民责任具有自觉性。责任并不是一种外部强加在人身上的义务,而是个体对相关事情作出恰当的反应或回应,表现出对相关事情负责的态度和能力。当个体对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这一事实开始觉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反应,这种产生反应的过程就是责任的发生过程。一个理智的个体具备选择的能力,如果他能够体认到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就会对自身与他人的联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促使外在规范的內化或形成道德的自律。因此,个体越是清醒地认识自己,就越会尽职尽责,这是内在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正如康德所言,个体行为不应该仅仅合乎责任,也应该出于责任。同样是缴税,消极公民只是为了完成义务不受责罚去做,积极公民则是为了共同体的发展而去做。因此,虽然责任实践或许需要制度或舆论的规范和保障,但归根结底,真正的责任行为只有通过主体的自愿选择来实现,内心的认可与承认是无法逼迫的,因而责任公民是主动公民。

第三,公民责任具有非对称性。在个体交往中,如果彼此关系仅依赖于利益互惠或价值利用,要求一对一的回报,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责任交往,而是工具性交往。因为个体的差异性使得公民的责任行为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称,公民的具体责任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特性,而是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个体感

受到彼此之间的休戚与共,获得对自我的认同与满足。在个体对社会的付出和贡献中,共同体为个人提供了交往和交流的机会,基于对共同体的认同,个体在整个交换关系网中并不期待短期的回报,其回报是一种超越有限的“总体交换”^①,在参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体善和公共善的统一,也享有了公民权利。因此,公民责任是无偿的、不求回报的,至少不追求形式上的回报,而实质的回报体现在责任践行过程中,追求共同体的利益就意味着民主政治生活的到来,个体生活也必将实现幸福。

第四,公民责任具有无限性。责任公民作为一个“他者性存在”,对于他人的责任是无限的。无限的责任,不是指没有边界的责任宽度,而是指自觉的责任深度。“在列维纳斯看来,所谓责任,不是成为某种制度的义务。”^[14]公民对他人和共同体的责任不只体现在具体做了哪件事情上,更是指公民内心时时刻刻存在关怀,依据善的信念而对他人和共同体作出负责的回应或反应。从个人道德走向公共美德,从为己责任到为他责任,更是超越“小爱”到达“大爱”。

三、公民责任教育:培养责任公民

公民责任要为每一个共同体成员所拥有,就必须经过公民责任教育。公民责任教育要求个体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并对此形成影响,但它主要是培养个体作为公民对共同体的感情及其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

1. 公民责任教育的目标

(1) 形成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个体自我概念确立的基础。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不仅能够让个体明白“我是谁”,更能增强个体对共同体的满意度,从而激发起内心对共同体的责任感。

公民责任教育首先要使个体明确自己在所处国家或共同体中的位置,明白自己是国家公民或共同体成员,形成身份认同。在明确自己属于国家或共同体一员时,个体就能够感受到共同体对自己的确认,感受到自身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个体在认识到自己是公民的时候,就会理解自己与他人和共同体的关系,对共同体的情感也会悄然生长。其次,在加深对共同体的认知过程中,个体将自觉地与他人交流,在互动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自己也会形成积极的情感。这种积极的责任情感首先表现为个体对社会现实的热情和关注。具有积极情

感的人,不论是对周围的人还是陌生的人都投以主动的问候和关切,必要时伸之以援手,他还对公共生活领域的事情保持持续的关注,以便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个体对共同体的情感还表现为对当代危机的忧思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积极责任情感驱使下的个人对现实危机十分敏感,他特别关切人类的发展,因而除了对社会现实的考虑,他还会思考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与对未来的责任。因为共同体不仅是公民个体的命运共同体,也是情感的共同体。最后,公民将自觉地承认自己是国家和共同体的成员,认可其他公民是自己的同胞,形成心理上的认同,不仅找到了身份的归属,也找到了情感家园和心灵的栖息地。这样的公民,内心充满对共同体的热爱,对其他同胞的关怀,他将负责任地做好每一件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

(2) 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并提高其参与能力。

权利公民对国家和共同体是冷漠的,面对公共生活,公民是十分消极的。而责任公民对共同体充满热爱和认可,对共同体的情感也会落实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中,责任公民会主动积极参与公共实践。在参与的过程中,公民才能不断地肯定自己,确立自身,公民才能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人,树立对共同体的信心。要引导个体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责任,就必须通过公民责任教育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并提高其参与能力。

公民首先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哪些行为属于公民参与行为。公民参与主要包括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和参与治理。社会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参与那些完全由公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区活动与非政府组织和社团。政治参与指对政治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指对公民社会的参与。^[15]公民参与不同于其他行动,明确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参与才会有效。其次,公民要理解和认同公民参与,承认自己是公民参与的主体,并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主动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参与能力。诸如以理解他人、形成合作、增进交流以及达成共识等为主要内容的个体关系能力,以确定范围、推理判断和理解批判等为主要内容的个体分析能力,以建立目标、解决困难和正确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的个体成就能力等等。最后,公民责任教育要引导公民主动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在公共领域中行动,形成责任行为的适应。公民应在公共参与中运用公民技能,并借助公民技能提高参与能力,解决公共问题。

2. 公民责任教育的内容

一般而言,个人责任可以划分为对自我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全球的责任。公民是相对于共同体而言的身份,公民的活动领域是公共领域,虽然自我责任是公民责任的基础,但它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发展。因此,公民责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全球的责任教育。

(1) 公民对他人的责任教育。

当代社会中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主体性得到了确立。但个体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难免使个人形成唯我独尊的意识。实际上,个人除了对自己的责任以外,还需要承担对其他共同体成员的责任。个体应承认彼此关系并相互关爱,体会人与人的密切联系,在公共交往中促进共同体的发展。在普遍意义上,每个人都对他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个体对他人最基本的责任是不伤害,个人要避免自己的言行伤害到其他人的身心健康和利益发展。在日常交往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责任还包括相互尊重、相互礼让、相互团结、与人为善等。但公民交往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中,公民交往的责任是对个体私人交往责任的进一步深化,个体作为公民更要明白彼此如何和谐共处于社会生活之中并追求公共利益。

培养公民对他人的责任,首先要使公民能够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不是一切关系的中心而是共同体的一份子;他人与自己处于平等的地位;每一个人都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责任主体;自己应关心并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亲人朋友,也要尽可能地帮助陌生的人……当公民能够理解和内化这些责任认知的时候,就能够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彼此。其次,公民要理解他人,学会协商和妥协。公民应在相互承认和尊重的过程中感受个体的差异,意识到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与个体彼此统一协调的必要性。公民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并不同于一般的人际关系,它是双方为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等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交流。再次,公民责任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同情心,引导公民学会自我控制,尝试换位思考,从而建立一种同情关系,彼此相互帮助。最后,公民要在帮助他人的基础上督促他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公民督促他人的责任是对助他责任的超越,助他责任是对他人生存的关注,督促他人则是对他人发展的关怀,即鼓励他人对世界进行独特的理解和对共同体的发展提出良好的建议。这种责任将个体之间的情感上升到现代理

性的高度,形成公民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勉励的人文责任。

(2) 公民对社会的责任教育。

社会为公民提供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公民承担社会责任是实现共同体认同的保障。因此,个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民社会责任的培养要使个体了解社会规则,掌握公共生活的知识,认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关爱意识,关心弱势群体,包容差异;具有公共理性,能够有效交流和沟通;参与社会实践,能够参加社会志愿活动,具备公益精神等。从具体实践层面来看,公民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涉及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公民责任教育要培养公民的民主素养、法律精神和经济德性。

良好的政治德性表现为民主素养。公民正是通过民主交往不断体验共同体成员的正义感和公正感,塑造着个体对共同体的忠诚和归属感。一方面,公民要尊重和保护民主制度,知晓公民权利和义务,监督政府机关的运行,合法参加出版、集会等政治活动,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对国家建设提供舆论支持。公民要具备合作精神和参与精神,在参与中提高公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信任和对国家的情感。另一方面,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应该是融入个体生活和性格的精神品质,以个体性的方式得以成长和体现。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能够增强个体对民主权利的认知、争取和行使,确立民主的权威。公民责任教育要引导公民破除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偏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为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选择负责。

公民社会责任还包括法律责任,体现为个体的法律精神。法律精神是公民基本责任意识的体现。公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紧密相连,个体首先必须明确法律规定的可为、应为和勿为。此外,法律责任意识还包含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不仅是规则体系,也是意义体系,表达着人们对于公平、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的追求。法律精神还蕴涵着对法律的敬畏,这种敬畏感不仅来自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责任后果,而且也因为公民对法律这一必要的恶的需要,它防止了人性毫无底线的堕落,保障了社会基本秩序的运行。从立法、司法到执法都离不开公民的推动和监督,从法律的确立到公民对法律的接受都影响着公民责任意识的发育。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还应该具备良好的经济德性。公民的经济德性是对“经济人”和“道德人”的

平衡。公民的经济德性主要包括自立、诚信和公正。经济独立是个体身份独立的前提,它要求公民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并能够科学理智地消费。诚信是维持市场经济的重要资源,其内涵已经由传统的道德要求和个人修养扩充到当代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公民没有诚信意识就会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使社会运行陷入瘫痪。因此,公民要在诚信的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而公正意味着个人要在降低社会贫富差距等维护公共利益方面作出贡献。各类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国家通过税收平衡社会差距,公民通过缴税的方式照顾社会不同成员的发展,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当代公民不仅要履行职业责任、债务责任,还要承担纳税的责任,同时公民责任教育应鼓励公民的慈善行为。

(3) 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教育。

引导公民承担国家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引导公民爱国。就个体而言,公民对国家的情感主要是在保卫国家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的对祖国的认同。就群体而言,公民对国家的情感表现为一种“民族意识”。爱国是公民个人的法律义务和职责,也是规范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政治要求。在实践领域,公民通过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要求维护国家发展,并表现出对国家的尊重和忠诚,以公民身份为载体而强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结纽带,满足国家对个体公民角色的期待。

爱国教育首先要让公民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了解本国政府及其构成,国家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还要认识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认识到个体在国家中的位置和作用,感受“我”与祖国的息息相关,理解“我”的身份继承以及国家对“我”的期望。对公民而言,爱国不只是具备某些知识和情感,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更要通过自身行为体现这种认同。因此,爱国教育要在公民认同的基础上引导公民从自身的工作和职务中寻找个体对国家参与和奉献的途径。个体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关心国家时政,还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理性参与国家治理,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要承担起监督政府和维护制度的责任。总之,个人或通过工作与职业在满足谋生需求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或通过个体化理解为国家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或在民族面临危机、群体生存受到挑战时毫不利己地奉献以捍卫国家的利益与尊严……这些都是个人承担国家责任和爱国的表现。

(4) 公民对全球的责任教育。

“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在这种不断扩大的空间中,世界公民身份不仅涉及更为广泛的公民权利,而且将责任扩展到超越国家的层次,“正在促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模式”。^[16]当代公民对全球主要有两大责任:国际理解和生态责任。国际理解是世界和平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基础,公民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一是促进个体对差异的包容和对多元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维护和平;二是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促进共同的认识,树立全球意识。国际理解教育可以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来进行,以促进相互之间语言、文化和思想的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要素是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应引导公民承认多元与尊重差异,认识各国或地区之间的不同,欣赏各自的独特性,并感知文化的共通之处,摒弃同质化主张,从而培养具有国际情怀的现代公民。

现代生态问题也最大化地体现了全球关联,生态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对共同体负责)向自然世界的延伸,……更富有成效的似乎是在责任领域延伸出一种公民身份。”^[17]生态公民意味着个体责任范围从人类社会已经扩展到了自然领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战略。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转变关于地球的观念》的报告,表明了教育界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回应。教育不仅应向公民传授处理环境问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是单一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中,而是与其他生物彼此依赖和相互关联。公民应该理性认识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认识生态和环境问题走向关注整个人类和自然的发展。

注释:

- ① 雅诺斯基用“有限交换”和“总体交换”的概念来解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前者指个人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的短期行为,后者指个体的行为是出于他人利益考虑的长期行为。见托马斯·雅诺斯基著、柯雄译:

《公民与文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94页。

参考文献:

- [1] 冯建军. 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6.
- [2] 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6.
- [3] 刘训练.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J]. 天津社会科学,2012,(6):61-65,83.
- [4] 密尔. 论自由[M]. 许宝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
- [5] 刁璠辉. 解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路——从消极到积极的个人本位[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23-27.
- [6] 张翠梅.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60.
- [7] 恩新·伊辛,布雷恩·特纳. 公民权研究手册[M]. 王小章,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8.
- [8] 公民共和主义[M]. 应奇,刘训练,编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90.
- [9] 哈坎·奥尔蒂奈. 全球公民:相互依赖世界中的责任与权利[M]. 祁怀高,金芮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2.
- [10][11] 基恩·福克斯. 公民身份[M]. 郭忠华,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90,68.
- [12] 吴威威.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J]. 唐都学刊,2007,(1):37-41.
- [13] 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M]. 竺乾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0.
- [14] 港道隆. 列维纳斯:法外的思想[M]. 张杰,李勇华,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25.
- [15] 饶满从. 主动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发展的新走向[J]. 比较教育研究,2006,(7):1-5.
- [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理念”的转变?[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熊建辉,校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57.
- [17] 巴特·范·斯廷博根. 公民身份的条件[M]. 郭台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67.

(本文责任编辑 曾 伟)